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澳洲台灣移民第二代的就業適應與回流之研究(II)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5-H-002-018-SSS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姜蘭虹

共同主持人： 徐榮崇

計畫參與人員： 宋郁玲 楊智翔 廖珮君 李宜蓓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報告附件：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7 月 25 日

摘要

近幾年來（1998-2005）有關移居澳洲台灣移民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多數集中在當前移民的背景、澳洲移民政策、移民的就業機會與社會適應、居住地選擇與流動、太空人家庭中的「單棲媽媽」等議題的了解，對於年輕第一代移民的適應與回流的議題尚未看到相關研究。

本研究計畫一共為期兩年，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其研究助理，在雪梨、布里斯本及珀斯一共訪問 99 位年輕移民，同時進行深入訪談及焦點團體訪談，以獲得對台灣年輕移民的深入了解。另外亦在台北市訪問 22 位從澳洲回流的台灣年輕移民。至目前為止本研究計畫之相關著作（包括作者及其研究生）計有一篇已發表，一篇投稿中，學生畢業論文則完成一篇，另一篇正在進行中。

研究成果顯示，在年輕移民的適應與回流方面，主要討論的是在台灣出生，之後隨父母移民澳洲的小孩，在當地的生活適應及長大後的就業與回流情形。年輕移民選擇回流台灣主要原因是為了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發展，並受到家庭團聚、找對象及對台灣的情感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選擇不回流的主因則為已經習慣澳洲。年輕移民在澳洲必須面臨英語能力不足、課業壓力、家庭型態和人際關係改變等適應問題，並因此影響到他們的身分認同。年輕移民的文化認同則是融合台、澳文化元素的雙重文化認同。

年輕移民回流台灣後，同樣會有語文程度的不足、就業創業的壓力、與家人同住的壓力和缺少人脈等問題。在對自己身分的認同上，會受到當初移出時的年齡、家庭教育、同儕群體、移民初期的經驗，以及與台灣連繫的緊密程度等因素影響。而其文化認同則是融合台、澳兩種文化元素的混合式文化認同。但兩種文化的比重則受到移民時的年齡、家庭教育的影響、同儕群體、居澳時間的長短而有不同。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上，年輕回流移民的重心會放在事業的規劃上，然而工作地點的選擇方面，則較為分歧，有的人表示回流後發現自己還是比較喜歡澳洲的生活，決定回澳洲定居；有的人滿足於目前工作的成就感，選擇繼續留在台灣就業；有的人表示將以台灣為基地，延伸到澳洲或其他地區；也有人表示，只要有好的發展就願意去嘗試，而不限定發展的區域。

國際移民是一種跨國行為（transnational practice），年輕移民的遷移及適應可以從本研究中獲得初步的了解。過去人口地理學中所採用的理論，如：推拉理論或強調經濟面向的遷移理論，常採用巨觀、大尺度的研究視角，對於所影響到的家庭與個人層面少有討論。希望藉此研究對跨國主義的文獻有所補充，並加深對澳洲移民的了解。

關鍵詞：跨國主義、一點五代、回流台灣年輕移民、就業、適應、雙重身份認同、澳洲。

Abstract

7/11/2005

Studies on Taiwanese immigrants to Australia in the last seven years (1998-2005) have included aspe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incorporation such as location decisions, employment,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housing preferences. While the age-sex structure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s in favor of young males and middle-aged women,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have included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nor mothers who take major responsibilities in taking care of the immigrant children, while husbands may have gone back to Taiwan or other countries for businesses. In recent year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se young Taiwanese migrants between the ages of 20 and 34 have been returning from Australia.

The research reviewed current literature on transnationalism. It shows that the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of the children of immigrants becomes less significant over time, as their connections to their homelands may be weaker compared to their parents.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s of the young returning migrants who emigrated at young ages with their parents, but who have returned as grown-ups as well as their levels of adaptation and their self-identities as they move between the two societies. In addition to a survey of 99 young migrants in the past two years in Sydney (32), Brisbane (30), and Perth (15),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ocused group interviews were also carried out. Moreover, 22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arried out with young return immigrants in Taipei. A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1) the decisions for staying in Australia, or returning to Taiwan. 2) types of problems faced by the 1.5 generations in adapting to the job market in Australia and Taiwan; and 3) their self-identities in Australia and Taiwan.

The in-depth interview of young return immigrants shows that while joining the job marke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establishing their careers in Australia and Taiwan, their adaptation and their self-identities between the two societies are complex in substance. Before their return, most of them evaluated bot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job markets in Taiwan and Australia. However, the chance of reunions with the families in Taiwan, the search for potential spouses and their affection towards Taiwan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decisions.

The young migrants' different experiences in the two cultures/societies of Taiwan

and Australia indicate that they have had to adapt to various aspects of their environments. The circulatory migration and mobility influence their self identity. Frequently, due to their constant need to adapt to both Taiwanese and Australian environments, they have developed a dual identity that encompasses Taiwanese and Australian cultures through which they strive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ir background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Keywords: Transnationalism, 1.5 generation, return young Taiwanese migrants, employment, adaptation, dual identity, Australia

第二年研究計畫期末報告

一、前言

自 1980 年代開始，臺灣中產階級崛起，這些人在所得增加之餘，除了經濟上的追求，更開始注重自身及家庭生活品質的提升。而當時臺灣在自然環境方面，工業化後帶來大量污染，造成生活環境不良。政治社會方面，兩岸關係持續緊張，國內政治的動盪，以及當時幾起重大的社會犯罪案件也都使得這些新興的中產階級感到恐慌。為了追求更佳的生活環境及子女教育而出現了新的移民潮。這些因素導致近二十年來臺灣移民的增加。這類移民的型態跟早期華人移民多是為了改善貧困生活，而遠赴海外謀生所形成的移民潮是不一樣的。

身為亞洲四小龍（臺灣、香港、新加坡、南韓）的經濟體（economy）之一，臺灣移民也成為「亞洲新移民」的一部分。這類移民有年輕的人力、資金、學歷、並具有一定社經基礎的優勢，頗受到移入國的青睞。其中國人移民選擇最熱門的移入國為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及日本。全球化的衝擊也使得臺灣人在居住國家的選擇性上更為多樣，所面臨的挑戰也更加複雜。

臺灣移民自 1980 年代晚期開始大量移居澳洲，到了 1990 年代達到高峰，根據澳洲普查資料得知，澳洲在 2001 年共有 22,418 位臺灣出生（Taiwan born）的移民，他們大多是以商業移民的身分申請，主要原因大多是為了尋求更好的子女教育及生活環境（life style）。因為較佳的教育程度被視為是向較高的社會階層流動（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主要途徑（Hardill 2002:79）。

二、研究目的

Kitano（1969）指出，不同世代的移民在語言、文化、經濟活動、同化程度、心理認同等各方面，均可能呈現不同的特質，這對移民研究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近幾年來（1998-2005）有關移居澳洲臺灣移民的研究成果包括：了解當前移民的背景、澳洲移民政策、移民的就業機會與社會適應、居住地選擇與流動、太空人家庭中的「單棲媽媽」等，至於年輕第一代移民的適應與回流則尚未看到相關研究。有學者認為第一代移民的跨國行為（transnational practice）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到了第二代移民將會持續的減弱（Levitt and Waters 2002），母國（homeland）的概念對他們而言是模糊且印象不深，其實已經有許多第二代移民不熱衷回母國居住，他們對母語也不熟悉，（Levitt and Waters 2002: 20）。Kibria（2002）針對在美國大專學校就讀的華人及韓國第二代移民研究指出，跨國性的行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已無法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研究認為研究第一點五代（1.5 generation）的年輕移民對跨國主義的深入了解是有其意義的。

所謂一點五代的年輕移民（Levitt and Waters, 2002: 12），即本文所欲探討的重點，指的是跟隨父母一起移居澳洲成長的小孩，是為了和在澳洲出生的第二代移民有所區隔。父母們為了子女教育飄洋過海來到陌生的澳洲，讓他們在澳洲社會中生活、學習、受教育，尋求家長眼中所認為的高品質教育（quality education）。

這些家長似乎主觀的以為，不管小孩的程度如何，來到了澳洲應該都可以讀得很好，並且符合澳洲主流社會所認定的高成就亞洲學生（high-achieving Asian students）（Jayasuriya and Kee, 1999: 43）。同時語言的優勢能使得他們在未來發展上更開闊，更具國際觀，且能在不同的文化與社會中伸展觸角。這些隨父母自臺灣移居澳洲的一點五代年輕移民，他們多在被動的情形下，不得不放棄和臺灣社會的關聯，重新接受新文化和新朋友。在多元文化澳洲的社會環境以及澳洲開放的教育體系下，解放了臺灣教育體制的枷鎖，除了必須接受新的社會與文化外，還必須承受來自於父母的傳統中國思想，以及父母因移民適應所產生的各方壓力，在移居地經歷涵化的過程（process of acculturation）。雖然他們在英語環境下學習與成長，但卻因為父母的關係，在就業及生活上與原居地社會仍保有相當高程度的互動，更由於父母的高教育水準和收入，讓他們接受著來自第一代的文化、社會網絡、價值觀及就業機會等的社會資本（Portes and Zhou 1993, Portes and Rumbaut 2001）。故而，他們在澳洲生活的行為表現上必須兼具澳洲與華人文化。

本研究為「澳洲臺灣移民第二代的就業適應與回流之研究」之第二年計畫，其探討的主題為「一點五代年輕移民在澳洲的適應、回流與自我認同」，希望探討的議題及達到的目的如下：

一、比較澳洲臺灣移民第一點五代在選擇回流臺灣或留在澳洲的因素。

1. 當他們受完教育而就業時，他們會選擇回臺灣還是留在澳洲就業呢？有哪些因素會影響他們選擇回流臺灣或留在澳洲？有哪些子女會選擇回流，哪些子女不會選擇回流？
2. 當第一點五代移民重新回到臺灣，會產生哪些新的適應問題？在海外受完教育的子女，在進入臺灣的就業市場是否順利？

二、探討澳洲臺灣移民第一點五代的自我認同情形--他們對於移居地與臺灣之間的自我認同情形為何？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根據姜蘭虹和徐榮崇（2003）從事《澳洲臺灣僑民現況之研究》資料的結果顯示：在澳洲移民的各年齡組中，表示回流意願最強的是 15-24 歲和 25-44 歲的年齡組，這些年輕族群的回流原因是想回臺灣就業或創業。這些人為何要離開澳洲，是值得探究與深思的地方。

三、文獻探討

（一）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過去對移民（migrants）的概念，總認為是需要遠離原居地（original country），並斷絕與家鄉的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和文化臍帶（cultural tie），更需要試圖融入移居地（destination）的社會、文化、經濟及政治體系，且認為移民後的新環境是他們的鄉土（homeland）（Levitt and Waters, 2002: 5）。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為，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已不再被視為是一種單向的遷移過程。移民不但結合了兩地的社會網絡、

活動及生活型態，而且還打破了自然的界線，將兩個不同的社會結合成一個社會（Glick-Schiller 1997: 158）。這是移民者在建立社會領域（social field）時，將原居地與移居地連結在一起的過程（Glick-Schiller et al. 1992: 1, Fouron and Glick-Schiller 2002）。進一步而言，由於科技的發展，促進了兩地間的交通及聯繫，同時亦改變了人們對時空距離的思維模式。雖然移民已遷入移居地，但仍可透過低廉的電話費用、衛星電視等來掌握原居地的脈動與信息。同時，頻繁的空中運輸，更有助於往返原居地與移居地。是故，移民到達移居地後，仍可與原居地的母社會保有密切的往來（Hsu 2002）。正如社會學者Portes（1996）所認為，與其說早期移民缺乏對家鄉的歸屬感，倒不如說今昔移民之不同，在於先進的通訊管道與運輸系統，增進了他們對家鄉種種需求的機會。因此，這些移民越來越喜歡保有他們與原居地的聯繫，進行著多方面的（multi-stranded）社會、文化、政治等活動（Levitt and Waters 2002: 5）。此等現象，學者Smith and Guarnizo（1998）和Faist（2000），前後相繼提出跨國性的社會領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與跨國性的社會空間（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等理論來探討。也正因為這樣的跨國性思維，使得許多學者相繼投入「跨國主義」的研究。

（二）第二代移民

1998 年春天，學者 Levitt 與 Waters 邀集了研究跨國主義的相關學者，於哈佛大學進行了一場主題為美國第二代移民（second generation）的研討會。並於 2002 年編輯了「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書中為跨國主義以及第二代移民做了註解，並提出在跨國主義思維下，第二代移民的研究方法、研究困境及未來的研究方向。近年來，相關學者亦陸續在跨國主義的基礎上，自不同角度與議題來探討第二代移民。Levitt（2001, 2002）研究愛爾蘭、多明尼加與印度的第二代移民跨國型態（transnational participatory patterns）發現，其主要的影響因素為：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生命歷程（life-course）以及階級與種族的特徵（class and racial characteristics）等三項。Smith（2002）研究自墨西哥移民美國的第二代，亦曾指出，生命歷程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同時亦認為種族、性別與階級（class hierarchies）影響著他們的跨國性活動。Fouron and Glick-Schiller（2002）研究移民美國第二代的認同問題，認為個人（personal）、家庭與社團（organizational connections）是影響第二代移民認同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認同感（identity）是由於種族（racial）、族裔（ethnic）和國家（national）此三要素所形塑（formation）。Fouron and Glick-Schiller（2002）認為，當二代移民越了解自己的家族史與故事，就越能整合這些故事和經驗至自我的概念中（self-concepts），其結果可能使第二代移民繼續進行跨國性活動，或重新思索並面對他們的移居地。Wolf（2002）研究菲律賓旅居美國的年輕移民指出，族裔自我認定的過程與第二代移民本身的實際（real）學習經驗有關，亦和其家長對第二代移民所提到的家鄉相關論述所形成的想像（imagination）有關。Light（2001）指出，當移民在同時保有並參與原居地

和移居地的活動時，他們無法完全的投入兩邊的活動，因為他們發現擁有多處的居住地（multiple localities）也可能產生多重的認同問題（multiple identities）。因此，跨國性的移民不僅對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忠誠對象，同時對於家（home）的意義，也有著複雜且多面向的看法。這讓移民者有了多重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的機會（Al-Ali and Koser 2002: 3），也可能導致移民在融入當地社會時所展現的不積極態度，對移居國的國家認同及公民義務(citizenship)的看法，也產生相當程度的減弱與衝突。在族群研究上，Glick-Schiller and Fouron（2001）認為，由於社會對於不同膚色的接收度仍低，為了能找尋到自我的社會地位，讓移民更易與來自於同一原居地的社群結合在一起。Vickermen（2002）研究紐約市的西印度群島第二代移民時發現，他們明顯的聚集在一個跨國性的社會空間中（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同時已重新建構起完備且具效率的文化體系，致使第二代移民在接觸他們的家鄉(homeland)時，不再需要回到自己家鄉的原居地，也正因此反而削弱了他們進行實際的跨國性活動（actual transnational practices）。Espiritu and Tran（2002）則對跨國主義提出不同的思維，他們認為跨國主義並不單指在實際行動上具有跨國性，同時在意象上也包含了第二代移民對原居地的記憶及文化的探索與渴望。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移民澳洲的第一點五代臺灣年輕移民（1.5 generation），指的是在臺灣出生，幼年時依附父母移民前往澳洲的人口。他們在澳洲受完教育，且已經或即將在澳洲或臺灣就業。

為深度了解臺、澳兩地移民第一點五代年輕移民在移民過程中的真實情況，本研究主要採取質性研究法中的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的方法進行研究，研究的取向則以 Johnston（1987）社會地理學「局內人（insider）」的觀點。在深度訪談上，研究的設計是仰賴非實證主義的科學觀，走的是非線性的路線，因而未在事前作太多的假設。因為，研究前是不要被太多的理論與假設限制住對研究的創見，故而深度訪談主要能發掘本研究中更切題的議題，以補強待答問題的面向。在訪談上，採取非結構式訪談，由訪談者和被訪談者就某個主題自由交談，被訪談者可以隨意的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見，而不必在意訪談者要的是什麼，訪談的內容隨受訪者的回答內容而深入探究。而焦點座談(focused group discussion)，主要是透過同質團體的對談，更強化或釐清訪談中的議題，讓問題更聚焦。為避免空談，討論內容將依據深度訪談內容設計半結構性座談議題（Hay, 2002）。此方法的優點為：訪談者和訪者之間的互動已經是結構化，研究主題也已事先定好，但受訪者依舊可以相當自由來表達其意見及態度，或自由掌握呈現的情境。本研究的進行係採取社會地理學「局內人」的觀點，以滾雪球的方式共取得澳洲臺灣年輕移民 99 位（雪梨 32 位、布里斯本 30 位、伯斯 15 位以及臺灣 22 位）為樣本，進行以深度訪談為主的質性研究。

五、結果與討論

（一）年輕移民的回流原因

年輕移民的回流是在多重因素綜合考慮下作成的決策，歸納其回流原因有：工作就業、家人、婚姻及對臺灣的歸屬感等因素。

在工作就業上，由於臺、澳兩地的就業環境不同，所需要的人才種類也不同，因此年輕移民們在澳洲就學時選讀的科系就會成為影響他們回流決策的考量因素之一。在澳洲主修商科和資訊等相關科目的年輕移民們會傾向回流臺灣找尋工作機會。而主修醫、農、文、法者則通常會選擇留在澳洲，因為醫科、法律等專業技術人才，在澳洲所學的專業和臺灣的不盡相同，因此多半繼續留在澳洲執業。而主修農科和文科者則是因為在臺灣的發展機會較少，所以也傾向於不回流。另外具備流利的雙語能力是年輕移民們選擇回流的主要原因之一。年輕移民們在澳洲的生活經驗不僅使他們培養了良好的英語能力，同時也使他們能夠更容易了解西方人的想法和思維模式，增加了和國外客戶談判的籌碼，因此格外容易受到上司的器重。另外，受訪的年輕移民們都具備中文聽、說的溝通能力，更有助於他們在臺灣工作就業。因此，受訪的年輕移民在找工作時，多半會找外商公司或是工作上負責與國外溝通的職務，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在工作上獲得更好的發展。相形之下，年輕移民們的雙語能力優勢在臺灣的工作機會還是會比在澳洲來的多一些。對年輕移民而言，他們的英語能力對於在臺灣工作會是一項優勢，但是在澳洲就業的時候，因為英語程度不如土生土長的澳洲人，語言能力反而成了在澳洲就業的劣勢之一。而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也會使得臺灣移民的價值觀和西方人有所不同，無法打入澳洲社會，形成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不足的情形。

在家人因素上，年輕移民們會受到家庭的影響而增加其回流意願，包括：家人團聚、接掌家庭事業或是順從家長意願等因素。年輕移民們會因為“家人都在臺灣”的原因增加其回流的意願。畢竟家人之間長期處於分開的狀態，如果能有機會在一起，應該是一件值得考慮的事。部分年輕移民會因為家族事業要接棒或需要創新而回臺灣。另外，有些女性的年輕移民回流臺灣是受到家長權威的要求。這顯示出臺灣女性受制於家庭和傳統價值觀的影響極深，因此即使在她們接受了澳洲自由、開放、兩性平等的教育後，她們在家庭中仍然必須順從父母（尤其是父親）的權威，在做重大決策（例如回流臺灣、工作、婚姻）時傾向於聽從家長的安排。

在婚姻找對象上，年輕移民多表示，他們在選擇對象時會以臺灣人為優先，並希望未來的對象是和自己背景相似的人，例如：出過國、在國外生活過、移民過、會講英文的。因為背景相似或有過類似經驗的人，能夠和他們有共同的話題，也能夠了解他們身處兩地文化間的一些矛盾處境。另外，年輕移民以臺灣人為優先結婚對象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未來結婚的對象是能和父母親溝通，會講中文的人。

在對臺灣的歸屬感上，部分受訪者表示，他們之所以會回流，是因為對臺灣仍有“根”的感覺。也就是這種情感因素讓他們再度回到自己出生的臺灣。另外有一些年輕移民在臺灣念完大學後才到澳洲繼續深造，他們到澳洲的主要目的是拿到學位，所以一開始就設定學成之後要回臺灣，對澳洲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們並未完全的融入。

其實，年輕移民們選擇回流臺灣是一個綜合評估下的決策，但由於年輕移民在這個生涯的階段裡，最重要的就是就業問題，在就業考量上的比重相形之下也就更為重要。因此，我們可以說年輕移民們回流臺灣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為了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發展。

（二）年輕移民在澳洲的適應情形及對認同的影響

對年輕移民而言，語言問題是需要克服的問題，因為語言能力關係著他們的生活、課業及交友。然而，部分家長並非只重視子女的英文程度，他們會希望子女移民澳洲後不要忘記中文，因此會要求子女在家講中文、並經常從臺灣帶來一些中文書籍、雜誌、錄影帶等，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能讓子女對中文不陌生，並具備中文的讀寫能力。

大多數的年輕移民在初到澳洲時，都會傾向於和臺灣人或華人（如香港人、大陸人）在一起，以建立安全感。當然每個人交朋友和融入新社會的速度和情形也會因自身的個性而有所不同。年輕移民在形成社交圈的同時，也會因為同儕的力量而影響其認同。朋友以臺灣人居多的年輕移民傾向於認同自己為臺灣人，也較能接受臺灣的文化和傳統價值觀。而朋友以澳洲當地人為主的年輕移民則多半認同自己是澳洲人或是來自臺灣的澳洲人。大部分年輕移民會因為在觀念、成長背景和語言上相似，而與同樣來自臺灣的移民結合成小團體，但共同的話題和興趣也會打破祖裔聚集的圈子。

對於年輕移民而言，移民後不僅要面臨新語言、新朋友的適應，家庭型態也產生了極大的轉變，如空中飛人或家庭分割兩地現象。年輕移民一致肯定家庭在移民過程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不僅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質上的供給、在生活常規上給予指導和提醒、幫助價值觀的養成，同時更在異文化的環境下，傳遞了中華文化的思想、行為和價值觀。隨著移民們在澳洲社會生活時間愈來愈長，他們也愈來愈能接受澳洲社會的文化，而產生了思想上的轉變，然而他們的父母卻因為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和傳統影響而不能夠接受子女想法上的改變，親子之間因而產生衝突與爭執。例如，父母仍維持傳統父權觀念，要求子女必須每天按時回家、依照他們的意思選讀大學主修科系、不能接受女兒交外籍男友等。而子女則因為同儕壓力想嘗試獨立自主，對父母提出不同的意見而引起爭執，親子之間因而形成代溝（generation gap）。

除了語言、人際關係和家庭的適應問題外，年輕移民在生活上也產生一些不適應，這些問題包括：覺得澳洲的生活步調太慢、不習慣澳洲的食物、地方大，環境不熟、沒有開車出門不方便、晚上太無聊、太安靜、購物中心或商店太早打烊，買東西不方便、看不慣澳洲人太隨性的態度等。還有一些隻身赴澳的年輕移

民則表示，在澳洲最不能適應的是想家和寂寞。我們可以說年輕移民們的適應問題是由外而內的，也就是他們的轉變是由適應外在的環境，到適應家庭內的文化差異，到思想行為的融合與轉化，而產生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類型出來，亦即年輕移民的適應情形會影響到他們的文化認同和身分認同。

隨著在澳洲居住的時間愈來愈久，年輕移民們也逐漸適應澳洲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然而，為了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發展，他們選擇再度回到臺灣。對這些在澳洲居住時間平均達 10 年的年輕回流移民而言，回到家鄉並不代表一切如故，相反地，臺灣社會在這段期間內不論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都不斷在變化。因此，再度踏上臺灣的土地，對年輕移民而言，其實是重新面臨適應的挑戰，只是這一次他們要適應的是心目中的故鄉。

（三）年輕移民回流臺灣後的適應和自我認同

大部分的年輕移民回流臺灣是為了就業或創業因素，因此回流臺灣之後，年輕移民除了必須重新適應臺灣社會之外，工作上的職場文化更是他們回流後適應的重要課題。透過了解他們回臺工作適應的情形，我們不但可以窺見臺、澳兩地在職場文化上的不同，更可以了解年輕移民在接受澳洲教育後觀念上受到的影響和轉變。而他們對臺灣社會的再適應也會影響到對未來生涯規畫的方向。

其實年輕移民對臺灣的職場仍有許多文化上的不適應。年輕移民們在澳洲生活多年，接受澳洲的教育並受到澳洲社會文化的影響，加上他們在離開臺灣前不曾有工作經驗，因此，在思考模式和行事風格上，很自然地是受到澳洲的影響，而與臺灣的職場文化有所不同。他們會不經意地在言談中夾雜英文、以及直率的澳式行事風格，常使得年輕移民遭受同事的側目。而不會講閩南話，中文說不好、寫不好，也使得他們與本地人溝通時有些障礙。因此，語言和人際關係也是他們在工作適應上的困擾問題。

（四）年輕移民的身分認同

年輕移民的身分認同主要是受到：移民時的年齡、家庭教育、同儕群體、移民初期的經驗，以及與臺灣連繫的緊密程度等因素的影響。當移民面對跨越地域的流動性及兩地文化的差異性時，往往同時受到固有文化與新文化的衝擊，成為夾雜在兩個文化間的邊緣人。而他們的身分認同也會因為立足位置的不同及身邊複雜網絡的影響，成為一個不確定的問題。

本研究中年輕回流移民的身分認同分為：臺灣人、是臺灣人也是澳洲人／一半臺灣人一半澳洲人、國際人／世界人等幾種類型。受訪的年輕移民當中約有半數以上的人很明確地表示自己是臺灣人。這些人的共同特徵為：父母都很重視他們的中文能力、會要求他們至少要會讀會寫中文、在澳洲時結交的朋友以臺灣人為主、每年都會回臺灣度假或探親等。另外，在高中以上階段移民者，由於居住臺灣的時間較長並受到臺灣教育的影響，對臺灣的文化和社會較為熟悉，他們多傾向於認同自己是臺灣人。年輕移民在兩種文化之間流動，對於臺、澳兩邊也都因為曾經居住過而產生特殊的情感，因此部分受訪者表示自己的身分為：是臺灣人也是澳洲人，或者是一半臺灣人一半澳洲人。這些受訪者的共同特徵是：在澳

洲時的社群關係包括了臺灣人和非華人以外的族群。在家中父母會要求講中文或者灌輸傳統價值觀，如家庭的重要、孝順、不忘本等。他們之中有些人還提到自己的身分是因地制宜的，在澳洲就是澳洲人，而在臺灣則是臺灣人，他們的身分會隨著所在地的不同而轉變。受到跨國主義思想（transnationalism）的影響，部分移民對於自己的身分定位已經脫離了傳統在母社會和目的地社會之間的二元選擇，而將自己的生活圈和經濟圈擴大到亞洲甚至所有英語系的國家。有受訪者表示自己的身分是國際人或世界人。這些受訪者多半表示自己對不同地方的適應力很強，能夠很快地適應一個新環境，對未來的去向，他們也不侷限於臺、澳兩地，而是只要有好的機會就會去發展。他們的朋友群也比較廣，包括各國的海外學生、各色人種都有。

（五）認同的矛盾

移民的文化認同會影響其身分認同，當他們對澳洲文化的接受程度愈大，也愈能夠融入澳洲社會，便愈能認同自己是澳洲社會的一份子；相反的，移民時年齡愈大，想法、價值觀及生活習慣都已有固定的模式，進入澳洲社會時所感受到的文化衝擊大，也較難融入澳洲的社會文化及生活型態，因此，較傾向於認同原來母社會的文化，也認同自己臺灣人的身分。家庭教育則是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對移民的下一代而言，家庭不但是傳遞傳統價值觀的最重要場所，同時也兼有保存中華文化的功能。

年輕移民們的文化認同是融和了臺、澳兩地社會文化和生活經驗的混合體，它會因為每個人的條件不同、所處的環境不同，而產生不同的類型。因此部分年輕移民認為自己在臺、澳社會間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因為不論在臺灣或澳洲社會，他們都一直在適應環境。年輕移民們處於這種文化交錯的情境當中，因為適應不良，會對自我的身分及文化的認同產生矛盾。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提高澳洲臺灣年輕移民在海外移民學術研究上的能見度，讓社會大眾能了解這些年輕移民在臺、澳社會間的流動情形，及其對臺灣的認同程度，也希望能將本研究中的發現轉化為對僑務工作的建議，期使專責機關能了解年輕回流移民的需求，並加以協助與輔導。其實年輕移民也是「愛臺灣」的，在臺灣成長的經歷讓他們對這塊土地也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和臺灣之間的連繫，不論在實質上或是在情感上是永遠割不斷的。這樣的情感對臺灣的未來必定是正面的助力，而他們在臺澳之間的商業行為也能夠促進臺灣的經貿發展。我國政府若能善用此點，在僑務工作上加強對僑民在中文教育、就業經商的輔導，使僑民成為開拓臺灣經貿發展的先鋒，相信他們也會是願意對臺灣出錢出力的支持者，而不是利益取向的掠奪者。

六、參考文獻

- 姜蘭虹、徐榮崇 (2003) *澳洲臺灣僑民現況之研究*。臺北市：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 楊智翔、姜蘭虹、廖珮君 (2005) 澳洲臺灣移民相關議題之研究。 *環境與世界*。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第 11 期。
- 廖珮君、姜蘭虹、徐榮崇 (2005) 年輕移民在臺灣、澳洲兩地之間的流動原因、適應與自我認同。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投稿中。
- 廖珮君 (2005) 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在臺、澳社會間的適應與認同。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Al-Ali, N. S. and Koser, K. (2002)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home", in N.S. Al-Ali and K. Koser (eds), *New Approaches to Migration? :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me*, Pp. 1-14, London: Routledge.
- Glick-Schiller, N. (1997) "The situation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Identities*, 4(2): 155-166.
- Espiritu, Y. L. and Tran, T. (2002) "Vietnam, my country: Vietnamese Americans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P. Levitt and M.C. Waters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p. 367-389,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Faist, T. (2000) *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uron, G. E. and Glick-Schiller, N. (2002) "The generation of identity: redefin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within a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in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p. 169-207,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Glick-Schiller, N. and Fouron, G. (2001) *Georges Woke Up Laughing: 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 and the Search for Hom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ardill, I. (2002) "Spatial mobility within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I. Hardill (eds), *Gender, Migration and the Dual Career Household*, Pp. 79-88, New York: Routledge.
- Hay, I.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Austral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su, J. C. (2002) "Residential choice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aiwanese migrants in Sydney, Brisbane and Melbourne (in Chinese)." Ph.D. Thesis, Chinese Cultural University.
- Jayasuriya, L. and Pookong, K. (1999) *The Asianisation of Australia? Some Facts about the Myths*.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 R. J. (1987)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Social Geography", in M.

- Pacione (eds), *Social Geography: Progress and Prospect*, Pp. 1-30, New York: Croom Helm.
- Kibria, N. (1990) "Power, patriarchy, and gender conflict in the Vietnamese immigrant community", *Gender and Society*, 4(1): 9-24.
- Kitano, H. H. L. (1969) *Japanese Americans: the Evolution of a Sub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 Levitt, P. (2001)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taking stock and future directions." *Global Networks* 1(3):195-216.
- Levitt, P. (2002) "The ties that change: relations to the ancestral home over the life cycle", in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p. 123-144,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evitt, P. and Dehesa, R. (2003)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tate: variations and explan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6(4): 587-611.
- Levitt, P. and Waters, M. C. (2002) "Introduction.", in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p. 1-30,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ight, I. (2001)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ism and trade",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0(1): 53-79.
- Portes, A. (1996) "Global villagers: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merican Prospect*, 25: 74-77.
- Portes, A. and Zhou, M.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 74-97.
- Portes, A. and Rumbaut, R. (2001)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mith, M. P. and Guarnizo, L. (1998) *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Smith, R. C. (2002) "Life course, generation, and social location as factors shaping second-generation transnational life", in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p. 145-167,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Vertovec, S. (1999) "Conceiv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2): 447-462.
- Vickerman, M. (2002) "Second-generation West Indian Transnationalism", in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Wolf, D. L. (2002)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Emotional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 struggles of second-generation Filipinos”, in P. Levitt and M. C. Waters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Pp. 255-294,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Yeoh, S. A. and Willis, K. (2004) *State/Nation/Transnation: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